

私淑老师兼启蒙老师

刘绪贻

在学术上，我是长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熏陶而成长起来的。直到四十年代后期，我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肤浅地知道一些名词和概念，如剩余价值、雇佣劳动等等；至于深一层的内容则几乎是一无所知。1947年末从美国回到珞珈山，这时自己微弱地怀有心向共产党、迎接解放的思想倾向，但经济学术思想体系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。

原来我在哈佛大学时，有一位研究统计、数学根基很好的姓蒋的好友，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，同一事象（如利息、利润等等）有各色各样的学说去加以解释，感到怀疑。他用数理科学为类比，认为对于一个事象的解释，不可能众说纷纭都是对的，应该只有一种解说是正确的。我对他这种看法颇具同感，希望自己日后有朝一日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正确的经济学。

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，我开始有认真阅读马克思经济学的要求，希望了解其深一层的内容。1948年下半年，我找到了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两部讲义：《社会学大纲》和《经济学大纲》。我把这两部书从头到尾，读得相当用心。从此，我对社会的经济结构、劳动价值论、剩余价值学说等等，开始有一些了解。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——发蒙的一课。这样，李达教授成了我这个领域的发蒙老师。同时，我虽然没有缘份听过他的课，但衷心尊敬他，以私淑弟子自居，奉他为私淑老师。

解放后，我先后任教政治经济学和《资本论》选读等课，一边学，一边教，逐渐进行学术思想的改造和转变。把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体系同自己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

那套庸俗说教相对比，逐渐辨明真伪，终于找到了、并且确信了多年来希望找到的那种正确的经济学。这同李达教授这两部著作对我的启蒙教育是分不开的。李达教授一生的重要业绩之一，是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真理，我就是一个受益者兼见证人。他含冤逝世多年了，至今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，敬重他，怀念他。

《社会学大纲》给予我的启示和鼓舞

刘绪贻

一九四七年九月起，我应聘到武汉大学讲授社会学。根据当时形势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大学教师，完全有责任给学生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知识，尽可能引导他们按照人民利益的需要走上正途。但是，在当时白色恐怖极其严重、马列著作无从找到而且即使找到也不能公开、自己这方面知识又很差的情形下，介绍马克思主义知识，真是谈何容易！不过，我总是在想办法、等机会。

大约是一九四八年上半年，有一天，我到汉口车站路一家旧书店去看书，发现一部李达同志著的《社会学大纲》。翻开阅读一阵，不禁喜出望外。原来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一部书。书面上

虽然题作《社会学大纲》，而内容则是历史唯物主义。李达同志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！因为列宁同志说过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；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《社会学大纲》，是名符其实。不过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学术界一般说并没有这种知识，他们只知道从欧美引进的社会学，这种社会学无害、甚至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，所以书名叫

忆李达校长

胡国瑞

扫尽昏霾天地清 惊心残魔记忆犹新
生灵十亿真儿戏 耆德宗师是罪人

天意何曾重斯文 万民乌狗总非仁
遗编精义斑斑在 大觉群生不庇身

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

《社会学大纲》，就可以保险，可以让它进大学的图书馆和课堂。当时我想，李达同志写这部书，固然是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方法，但却好象就是为我当时的需要写的。我把这部书买了回来，后来又促使有关图书馆准备了五、六部。于是，我不动声色地把这套书作为选修社会学的学生的必读参考书，而且列为期终考试的考试内容。这样，选修社会学的一百多个学生就非读点历史唯物主义不可。

不久，就有少数学生反对我的这种做法。他们表面的理由是功课重，没有时间看这一大套参考书。但是，提出反对的却是那些平日反对进步学运的学生。我硬着头皮顶住了。但到期终考试时，他们大闹起来要罢考，我仍然坚持不让步。后来在进步学生的带头下绝大多数学生支持我，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参加考试，还要答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试题。

在这场风波中，我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，但我深深觉得，这些人闹罢考，并不真正是因为功课重，而是因为他们阴谋反对李达同志宣传的历史唯物主义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李达同志坚持马列主义，反对林彪的顶峰论等等，因而受到诬

陷，被迫害致死。十余年来，每一回忆这段往事，想到李达同志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遭遇，总不禁十分沉痛。那时，反对共产党的学生虽然不准我让青年人读李达同志著作，他们毕竟未能得逞。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个一生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而且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，反而不能免于一死。今天悼念李达同志，岂只能是悼念而已！

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

鹤师早年在北平 教学二三事

尹 进

早在二三十年代，也就是在那灾难深重的旧社会里，凡向往革命的同志，那个不晓得著作甚丰、坚持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李达呢？那个又不渴望能有机会见到这位著名的理论家而亲聆教益呢？

一九三三年初春，李达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任教了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由仰慕他的盛名而成为他熟识的一个学生，他也就成为我敬爱的老师。由于老师字鹤鸣，以后通信时我总是尊称他为鹤师。现在鹤师仙逝多年了，每当想起他多年的教导，就象在彩色电视镜屏上看到他的真实活动一样，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恸。

我在学生时代是爱听鹤师讲课的学生之一。那时他体弱多病，讲课声音不洪亮，有时甚至显得吃力。可是只要你聚精会神地听，立刻就会感到，他语言简洁，没有废话。课后复习笔记，恰象读一篇精彩的论文。也许就是因为鹤师的笔述胜于口述吧，我曾亲身领教过他以笔代口讲课的精彩表演。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春，他正为我们讲社会学课，也就是讲解后来在上海出版并在延安翻印的那